

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《四库书目度藏表》考

黄 汉

内容摘要:《四库全书分架图》作为《四库全书》的重要组成部分,详细著录了库书的排架位次、函数、合函等情况,有助于检寻库书和指导排架。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所藏《四库书目度藏表》实为直式《四库全书分架图》,是馆臣办理库书补函、排架时抄写的一个工作簿,抄写于嘉庆四年(1799)至嘉庆九年二月初一日之间,所抄分架图主体部分为乾隆时期所写,又补入了嘉庆时期库书排架变动的信息。对比“南三阁”目录与“北三阁”架图,结合《度藏表》与《文渊阁分架图》的性质及二者联系,确定《度藏表》归属文渊阁系统,亦反映“北四阁”《四库全书》的排架情况。《四库书目度藏表》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可以借此窥探嘉庆时期《四库全书》增补抽改和架次调整排定的真实情况。

关键词:四库全书 分架图 文渊阁 改函 排架

《四库全书》纂定后,度藏七阁,分架陈设。然而全书篇帙浩繁,排架、检阅非易,除了以四色装潢面页外,又制分架图指导排架和检寻库书。《四库全书分架图》,又称排架图、架图目录,有横式、直式两种^①,每种分经、史、子、集,共4册,各册详细著录《四库全书》的排架位次、函数、合函等情况。迄今发现的分架图有《文渊阁四库全书分架图(直式)》(以下简称《文渊阁分架图》)、《文渊阁四库全书分架图(横式)》、《文津阁四库全书分架图(横式)》、

①横式《四库全书分架图》仿照《四库全书》书架样式印制,架框为黑色,框内上方写“钦定四库全书”、右侧写“某部第某架”。框内四部各以四色印制方格,经部、史部每架分4层,每层12格;子部、集部每架分6层,每层12格。书名依次填入格中,若1格中有数种书,则上下书写,并画横线在书名下以示分隔。直式《四库全书分架图》形制与本文所论《度藏表》面貌相仿。有关二者的面貌、性质、抽改等,笔者已另撰文说明。

《文溯阁四库全书分架图(横式)》^①。除此之外,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还收藏有一部《四库书目皮藏表》(以下简称《皮藏表》),亦为《四库全书分架图》^②。学界目前对于《四库全书分架图》的研究甚少^③,且《皮藏表》在探究直式分架图性质及抽改、《四库全书》补颁与排架调整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,故笔者不揣简陋,就《皮藏表》的性质、抄写时间、价值等略作考证,以就教于方家。

一、《皮藏表》的基本面貌与性质

《皮藏表》按经、史、子、集分为4册,线装。各册抄写于朱色印制的格纸上,该格纸框高23.5厘米、宽14.5厘米,无版心、鱼尾、页码;每半页页眉印有“部第架第层”,分上、中、下3行,每行纵向4格,每格格前印有“第函”,共12格,即每半页为1层,每层放置12函书。其中经部、史部每4层为1架,共放置48函书;子部、集部每6层为1架,共放置72函书。又有墨笔于页眉填入每架《四库全书》的部类、架数、层数,并于格中依次写录《四库全书》各书的函次、书名、函数,部分图书还载有合册情况、撰人姓名。是书著录经部书共20架960函,史部书33架1584函,子部书22架1584函,集部书28架2016函,共计103架6144函。4册皆无序跋,惟第1册封面墨笔题“四库书目皮藏表一”,卷首钤“梅华书室”印。

1. 用纸

《皮藏表》书间存在数量较多的红蓝色横截式印记及“吴正裕号”槽户印

①七阁都应有分架图,御案前亦陈设有一部,即乾隆五十五年七月十二日奏折所称“书籍次序,既经更改,所有御案前陈设之《总目》、《考证》、《分架图册》,均应另缮,亦经陆锡熊带回办理”(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:《纂修四库全书档案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7年,第2191页)。

②沈津主编《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·史部》著录此书,称之为“清乾隆写本《四库全书分架图》”(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11年,第799-800页)。按,《皮藏表》与《文溯阁四库全书分架图(直式)》格纸的版式、文字、版框缺损处完全相同,书写形式、记载内容亦十分相似,故判定其为《四库全书分架图》。

③李祚唐《〈四库全书〉乾隆检索路径初探》谈及《文溯阁分架图》的功用、缺点、涂改(《四库全书研究文集——2005年四库全书研讨会文选》,敦煌文艺出版社,2006年,第139-150页);李晓明《文津阁〈四库全书〉排架考》谈及《文津阁分架图》、排架的挖改与变动(《文献》2004年第1期,第31-35页)。

号^①。陈介甫考证,古籍中横截式印记“类似于骑缝章的作用,在整捆纸的上下口或两侧铃盖,亦可避免整捆纸在运输、交易过程中拆动,保证整捆纸的完整性。另外,一般整刀最外一张的刀口边上还会加盖一个小长方形纸号戳记,常见有‘某某号’或‘某某号荆川太史纸’”。印有“吴正裕号”槽户商号的纸通常为荆川太史纸,竹纸,明末始见,清康熙乾隆三朝相对流行。该纸产自福建、江西、湖南三个竹纸大省,其中质量上乘者可用于内府印刻书籍。清内府在办理《四库全书》时有使用“吴正裕号”纸张的情况,如翁方纲所纂《四库提要稿》用纸便铃有“吴正裕号”楷书长方阳文印记。《皮藏表》使用“吴正裕号”竹纸,与北四阁《四库全书》所用“金线榜纸”^②以及南三阁所用“坚白太史连纸”不同,但印制版式、文字、版框缺损处又与《文渊阁分架图》相同,可见其应为内府印刻、写录,但并非随《四库全书》陈设诸阁之中。

2. 眉批

《皮藏表》在各部小类起始处书籍的右上方用墨笔画一圆圈,并于天头注明类属、部数、卷数,如“易类共一百五十九部一千七百四十八卷、附录八部十二卷”“典礼二十四部一千五十一卷”,全书共93处,笔迹与正文相同^③。此文字与《四库全书总目》^④于每部类、属别的提要后总记部数、卷数十分相似,如“右易类一百五十九部一千七百四十八卷、附录八部十二卷,皆文渊阁著录”“右政书类典礼之属二十四部一千五十一卷,皆文渊阁著录”。将《皮

①关于古籍中红蓝色横截式印记及槽户印号,学界目前的研究主要有:张宝三:《清代中文善本古籍中所铃纸厂印记研究》,《台大中文学报》2012年第39期,第213-246页;张宝三:《纸厂印记在清代中文善本古籍版本鉴定之运用》,《“国家图书馆”馆刊》2015年第2期,第35-52页;宋叶:《传世古籍中“纸号”的搜集和整理》,天津师范大学硕士论文,2018年;陈介甫:《古籍文献中的纸号戳记之“红蓝横截式”印记》,楮盒说纸(微信公众号),2019年5月29日。关于红蓝色横截式印记的形成原因,陈介甫的研究举实物加以论证,言之凿凿,可成定论。下文所引陈说均据此。

②曾担任《四库全书》校勘的周广业称:“四分《全书》俱用泾县榜纸。续办三分《全书》用棉白榜纸,纸质稍薄,后后面页恐有磨损,仍用泾县榜纸为页。”(周广业撰,祝鸿熹、王国珍点校:《周广业笔记四种》下册,浙江古籍出版社,2018年,第151页)而易晓辉考证并通过纸样纤维测定确认,北四阁《四库全书》所用的“开化榜纸”(实际应称为“泾县榜纸”)是由纯青檀皮所造,原产地在安徽泾县一带,与宣纸为同一体系(《清代内府刻书用“开化纸”来源探究》,《文献》2018年第2期,第154-162页)。

③书中有漏标圆圈者,如易类、书类、地理类河渠之属等;有误标圆圈者,如小学类字书之属误标在《说文解字》之上等。

④纪昀纂:《武英殿本四库全书总目》,国家图书馆出版社,2019年。下文及表格所引,皆据此。

藏表》与武英殿本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记载对比,仅有三处不同(详见表1):

表1

《皮藏表》	武英殿本《四库全书总目》
仪礼二十二部三百四十三卷、附录二部一百二十三卷	右礼类仪礼之属二十二部三百四十三卷、附录二部一百二十七卷,皆文渊阁著录
释家类十三部三十二卷	右释家类十三部三百十二卷,皆文渊阁著录
别家类一千十五部一万八千七十二卷	右别集类一千七十五部一万八千七十二卷,皆文渊阁著录

清查文渊、文津、文澜三阁《四库全书》仪礼之属附录《内外服制通释》《读礼通考》,卷前提要及实际卷数各为七卷、一百二十卷,武英殿本、浙本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记载亦同。二书共计一百二十七卷,故《皮藏表》所记“一百二十三卷”应是书写讹误。至于释家类与别集类差异,应分别是《皮藏表》漏写“百”字、“七”字以及错写“家”字所致。与此同时,《皮藏表》眉批与浙本、粤本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所记以及清点文渊、文津、文澜三阁《四库全书》的实际部数与卷数均有较大出入,所以眉批很大可能抄自武英殿本《四库全书总目》,或与殿本《总目》有同一来源。

3. 笔迹差异与修改痕迹

《皮藏表》笔迹情况相对复杂,暂将其分为两类,一类称原书笔迹,指最初在格纸上写录《四库全书》各书的函次、书名、函数的笔迹,包括此时产生的修改痕迹;一类称后改笔迹,指在写录完四册后产生的与原书笔迹不同的修改笔迹。

就原书笔迹而言,第1册经部与第2册史部笔迹不同,书写习惯上亦存在细微不同,如经部抄写者多写作“解”“註”,史部抄写者多写作“解”“注”;第3册子部第9架第3层第3148函前后笔迹差异明显。同时在写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修改痕迹,经部第16架第1层第727函《六经正误》,“六”字为贴纸覆改;史部第19架第3层第1850函,函次数“五”字为贴纸覆改。

就后改笔迹而言,直接修改的笔迹大致有改、补、删三种形式:①史部第14架第2层第1602函《商文毅疏稿》的“疏”字描改为“奏”;集部第28架第5层第6130函《十五家词》,“五”字系描改,原作“六”。②经部第5架第1层第203函在函格内《禹贡指南》《禹贡论》左侧直接补写“《山川地理图》”;第6架第4层第287函《毛诗集解》书名上浅色墨写“殷氏”二字。③子部第22架第4层第4096函作“《老子道德经注》王弼”,点删去“王弼”二字;集部第17架第4层第5327函作“《御制诗集》二十九”,点删去“御制诗集”四字。

同时,《皮藏表》还有杂用几种形式的修改,史部第33架第1层第2508函《史通释文》点删去“文”字,并补入“通”字,作《史通通释》。

除了较多的直接修改痕迹,还有部分贴纸覆改痕迹。经部第3架第3层第125函《儿易内外仪》,“儿易内”三字为原书笔迹,“外仪”二字为贴纸覆改,笔迹与“儿易内”不同,纸片后隐约可见“以外仪”三字,《文渊阁分架图》作“儿易内仪以外仪”。第7架第4层第336函贴纸重写为《毛诗写官记》《诗札》合册、《诗传诗说驳义》《续诗传鸟名卷》。《皮藏表》的笔迹差异与修改痕迹,说明其并非出自一人之手,抄成后又进行了一定的修订。

《皮藏表》用不同于七阁库书的竹纸印制、写录,成于多人之手,且书中有大量的修改、勾画痕迹以及红蓝色横截式印记和纸号,可以判定它并不是陈列或者说抄写后置于各阁之中的^①,而是馆臣办理库书补函、排架时抄写的一个工作簿^②,贮藏于内府。

二、《皮藏表》的年代

《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·史部》(以下简称《善本书志》)认为《皮藏表》是清乾隆写本,此说法一则过于宽泛,二则可能有误。首先,从避讳字方面来看,《皮藏表》所载《太玄经》《太玄本旨》《玄真子》“玄”字皆改作“元”,此是避康熙帝玄烨讳;所载《弘明集》《广弘明集》“弘”字皆缺末笔,此是避乾隆皇帝弘历讳。但著录的《名臣碑传琬琰之集》《明名臣琬琰录》不避嘉庆皇帝永琰讳,《宁海将军固山贝子功绩录》《宁极斋稿》不避道光帝旻宁讳。这说明《皮藏表》正文的主体部分应形成于乾隆时期。其次,上文所论《皮藏表》眉批很大可能抄自武英殿本《四库全书总目》,据考证,武英殿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刊竣时间为乾隆六十年(1795)十一月^③,则眉批的形成时期应晚于此时。

更重要的是,根据《皮藏表》所载书籍的装函情况能进一步判定其具体年代。《南巡盛典》初颁42册、装7函。嘉庆四年(1799),重颁63册,改装

①横式《四库全书分架图》纸质精良,抄写工整,书格各以四色印制,又钤有各阁御宝,应为陈列于各阁之物。

②直式《文渊阁分架图》的基本面貌与《皮藏表》十分相似,书中多可见修改、勾画之处,笔迹潦草甚于《皮藏表》。如史部第22架第4层第2005函至第23架第3层第2052函直接涂改,字迹潦草。

③崔富章:《〈四库全书总目〉殿本刊竣年月考实》,《版本目录论丛》,中华书局,2014年,第51-61页。

14 函;嘉庆十二年(1807),奉改 6 函^①。而《皮藏表》所载《南巡盛典》为 14 函装本,应是嘉庆四年重颁的版本,并未经过嘉庆十二年的改函。又嘉庆八年十二月初七日,庆桂因办理文渊阁空函书籍告竣上奏云:“(《圣制诗五集》《八旗通志》)现在已将一分抽换整齐,同此次恭缮之《圣制文三集》、《诗文馀集》各一分,一并校完,理合先行呈览。统俟发下后,请旨交懋勤殿用宝,交武英殿按照旧式用分色绸装潢缮签。仍令吴裕德会同内务府官员将书匣面签抽换齐全,依次归架,其排架图一分,亦应一并更正。”^②嘉庆九年二月初一日,庆桂又上奏称:“窃查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应行缮写补入之圣制诗文各集及《八旗通志》,前经原任编修吴裕德恭缮齐全,于上年十二月内奏呈御览……其陈设排架图一分,亦已增改等语。臣等亲赴文渊阁,检视一切,俱属妥协。”^③故文渊阁《御制诗五集》至嘉庆九年二月初一日已全部排架完成,《分架图》亦一并更正。而《皮藏表》集部第 17 架第 5 层第 5335 函至第 18 架第 1 层第 5354 函则为空函,可知此时《御制诗五集》并未排架,所以这部分正文应形成于嘉庆四年(1799)至嘉庆九年二月初一日之间。

通过避讳判定《皮藏表》正文的主体部分形成于乾隆时期,结合武英殿本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刊竣时间考订出眉批的形成或晚于乾隆六十年十一月,而根据《皮藏表》所载书籍的装函情况判定部分正文形成于嘉庆四年(1799)至嘉庆九年二月初一日之间。出现这种不一致,可能有两种情况。第一,《皮藏表》部分册页经历过抽换^④。因为分架图的主要功用是检寻所藏库书,为了准确查明某书实际的皮藏位置,分架图必须随着库书改换、补颁,进行抽换修改,甚至重新缮写。如乾隆五十三年十月三十日奏折称“臣今拟即将

①此据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图书馆所藏《文汇阁〈四库全书〉目录》史部正文间小字夹注、批语。该目录的概况、底本抄写年代及文献价值,详见唐宸、黄汉《台湾藏〈文汇阁四库全书目录〉抄本考》(《文献》2019 年第 4 期,第 166-176 页)一文的考证。

②《纂修四库全书档案》,第 2385 页。

③《纂修四库全书档案》,第 2387-2388 页。

④直式《文渊阁分架图》也为考察分架图的抽换提供了素材。该分架图史部第 31 架第 3 层第 2428 函至 2436 函置《八旗通志》9 函,编号 1 至 9;第 31 架第 4 层第 2437 函至第 32 架第 1 层第 2455 函置《八旗通志》19 函,编号 1 至 19,末函注“共二十八”,这说明《文渊阁分架图》实际抽换了整个第 31 架的架图,共 2 个筒子叶,而第 32 架的架图并未抽换,仅其上注明总数。这 2 个筒子叶与“共二十八”四字的笔迹明显有别于其他页,亦可证明。至于集部第 17 架,直式《文渊阁分架图》并未抽换,只是于第 17 架第 5 层第 5335 函增加“御制诗五集”五字。此外,横式《文渊阁分架图》亦有抽换的情况,但两书均是局部册页抽换。

文津阁架图目录先行抽换。其抽改之页,臣带回京中,以便照改三阁架图目录”^①;乾隆五十五年五月初四日奏折称“再查文溯阁书函,应照三阁新定架图重新排次。……至应撤回另办之排架图册等,谨一并查明带回,分别办理”^②;嘉庆十一年八月奏折称江浙三阁“其排架图令其送京改缮发往”^③。第二,《皮藏表》是抄写者因库书改函、排架改动,重新誊抄所成。其所据分架图主体部分为乾隆时期所写,抄写者依书直录,故只避康熙、乾隆皇帝讳,不避嘉庆皇帝讳。而《八旗通志》等书所在分架图册页伴随嘉庆时期库书的撤回、补颁进行抽换,抄写者记录新的函次、排架信息,所以《皮藏表》呈现出嘉庆时期的面貌。

如前文所论,《皮藏表》成于众手、原书笔迹有异,但是经过嘉庆时期改函的《南巡盛典》等书所在册页笔迹与本册前后笔迹基本一致,所以《皮藏表》应为第二种情况,即抄写于嘉庆四年(1799)至嘉庆九年二月初一日之间,所抄分架图主体部分为乾隆时期所写,又补入了嘉庆时期库书排架变动的信息。

三、《皮藏表》与“南三阁”目录的比较

文汇、文宗二阁被太平军付之一炬,片纸不存。咸丰十一年(1861)太平军又攻克杭州,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散失,丁氏兄弟抢救抄补,钱恂、张宗祥其后继之,库书终得齐全。故《善本书志》称《皮藏表》“原装绢面佚失,又无其他标志,未辨此半部《分架图》原属文源、文澜、文宗、文汇哪一阁所有。惟书中多有污渍,纸亦焦脆,或为文澜阁散出者亦未可知矣”^④。

文宗、文汇二阁虽不存,幸有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《文宗阁〈四库全书〉装函清册》(以下简称《文宗阁清册》)^⑤与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图书馆所藏《文汇阁〈四库全书〉目录》(以下简称《文汇阁目录》)可供参考,文澜阁亦有《钦颁

①《纂修四库全书档案》,第2148页。

②《纂修四库全书档案》,第2177页。

③杨丰陌主编:《盛京皇宫和关外三陵档案》,辽宁民族出版社,2003年,第139页。

④《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·史部》,第800页。

⑤《文宗阁清册》的概况、抄写年代及文献价值,王茜、琚小飞等先后有所考证。详见王茜:《〈文宗阁四库全书装函清册〉说略》,《文献》2002年第3期,第160-163页;琚小飞、王昱淇:《嘉庆朝〈文宗阁四库全书装函清册〉考》,《历史档案》2017年第3期,第100-107页(下引此文简称“琚文”)。

文澜阁四库全书书目清册》(以下简称《文澜阁清册》)①堪作查验。对比四者②,差异甚多,略举数则,如表 2、表 3、表 4 所示:

表 2 合函差异表

部别	函次③	《皮藏表》	《文宗阁清册》	《文汇阁目录》
经部	225-226	《尚书表注》《读书丛说》合 1 函;《书纂言》1 函	《尚书表注》1 函;《书纂言》1 函④	《书纂言》《尚书表注》合 1 函
经部	787	《中庸辑略》《石鼓论语答问》《论语易原》合 1 函	《中庸辑略》《论语意原》合 1 函;《石鼓论语答问》1 函⑤	《中庸辑略》《论语意原》合 1 函;《石鼓论语答问》1 函⑥
集部	6090	《东坡词》《山谷词》《淮海词》合 1 函	《东坡词》《山谷词》《淮海词》《后山词》合 1 函	《东坡词》《山谷词》《淮海词》《后山词》合 1 函

表 3 函数差异表

部别	函次	书名	《皮藏表》	《文宗阁清册》	《文汇阁目录》
经部	854	《御制律吕正义后编》	10	10	9
史部	1150	《辽金元三史语解》	3	4	3
子部	4110	《庄子翼》	2	2	1

①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道光四年(1824)金裕新造送《钦颁文澜阁四库全书书目清册》3 册,乃是残帙,存子部、集部 2 册,另附《清理书籍核对不符谨请存案清册》1 册。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《钦颁文澜阁四库全书书目清册》经部 1 册,经笔者目验,与前者同为一部。书中地脚偶有按语,如“今查重发书目内有《同书》四册,因查《分架图》内未列此种,未便补入”。此亦可证文澜阁确有《分架图》。

②笔者对四种文献做了全面比较,发现“南三阁”库书记载与《皮藏表》差异颇多。但由于四者抄写时间上存在差异,库书存在抽换、补颁等情况,故仅选取其中相对稳定、无较大变化的库书作为主要证据列出。其中《文宗阁清册》未记载书籍合册,《文澜阁清册》未记载书籍函数,故阙。

③三表函次皆据《皮藏表》(其中表 3 所列“函次”为该书第 1 函之函次)。“南三阁”目录所载或与此有异。

④二书相隔 17 函。

⑤两函前后相次。

⑥二书相隔 2 函。

表4 合册书籍差异表^①

部别	函次	《庋藏表》	《文汇阁目录》	《文澜阁清册》
经部	40	《易图说》《古周易》合册	《易图说》1册,《古周易》1册 ^②	《易图说》1册,《古周易》1册
经部	336	《毛诗写官记》《诗札》合册	《毛诗写官记》2册,《诗札》1册	《毛诗写官记》2册,《诗札》1册
子部	3276	《墨谱法式》《墨经》合册	《墨谱》1册,《墨经》1册	《墨谱》1册,《墨经》1册
子部	3285	《筭谱》《菌谱》合册	《酒谱》《蟹谱》《菌谱》合册,《筭谱》1册 ^③	《酒谱》《菌谱》《蟹谱》合册
集部	6095	《酒边词》《无住词》《漱玉词》合册	《酒边词》1册,《无住词》1册,《漱玉词》1册 ^④	《无住词》《漱玉词》合册,《酒边词》1册

此外,《庋藏表》著录图书的书名、排架次序等亦与《文宗阁清册》《文汇阁目录》《文澜阁清册》有异^⑤,可知其并非由“南三阁”散出。

四、《庋藏表》与“北三阁”架图的比较

《文渊阁四库全书分架图》收藏于台北“故宫博物院”,第一部为直式《分架图》,包背装,共4册,分装4函。形制如《庋藏表》,每半页版框高23.5厘米、宽14厘米;第二部为横式《分架图》,梵夹装,共4册,分装4函。形制如上文所述,每半页版框高43厘米、宽25厘米。

《庋藏表》与《文渊阁分架图》性质相似,今对比两书,以窥探其异同。

在外观形制上,《庋藏表》与《文渊阁分架图》的版框尺寸、格纸版式、板框缺损处都基本相同。在记载内容上,二书经部所载图书函次、函数、合函、合册完全相同,部分著录差异是由于后来修改所致(详见表5)。

①本表不全录每函全部书名,仅记合册书籍有异者。
②二书分置异函,相隔5函。
③二书分置异函,相隔2函。
④《文汇阁目录》此函又装《竹坡词》1册,而《文宗阁清册》则为《酒边词》《无住词》《石屏词》《竹坡词》合函。
⑤笔者汇校《文汇阁目录》等文献,制成《〈四库全书〉四阁函册考异表》(《国学》第8集,巴蜀书社,2020年,第49-80页),能更直观地了解《庋藏表》与诸阁记载之差异,可参看。

表5 经部著录差异表

架次	层次	函次	《庋藏表》	《文渊阁分架图》 ^①
2	1	58	《淙山读周易记》 ^②	《淙山读周易》
3	3	125	《儿易内外仪》 ^③ 《卦变考略》	《儿易内仪以 外仪》《卦变考略》
5	1	203	《禹贡指南》《禹贡论》《山川地理图》	《禹贡指南》《禹贡论》 ^④
6	3	267	《苏氏诗集解》	《苏氏诗集传》 ^⑤
6	3	275	《诗补传》 ^⑥	《诗补传》 ^⑦
6	4	279	《诗集传》	《诗经集传》 ^⑧
6	4	287	《殷氏 ^⑨ 毛诗集解》	《毛诗集解殷氏》 ^⑩
7	4	326	《日讲诗经解义》 ^⑪	《日讲诗经解义》留空 ^⑫
13	1	587	《左氏传续说》	《左氏传续说》 ^⑬
15	3	702	《惠氏春秋说》 一	《惠氏春秋说》 书一 ^⑭
15	4	715	《古文孝经孔氏传》《孝经注疏》 ^⑮ 《孝经指解》	《古文孝经孔氏传》《孝经注疏》 ^⑯ 《古本孝经指解》

①若一书有多函,分架图会在书名旁记载函数。今对比表中一般不抄录函数。

②“记”字与其余五字笔迹墨色深浅不同,应为后补。

③原作“儿易内仪以 外仪”,详见上文。

④文渊阁本《山川地理图》附于《禹贡论》之后,合订为1册。故此处实为《文渊阁分架图》漏记该书。

⑤原作“苏氏诗集解”,后圈去“解”字,下补“传”字,与原书笔迹不同。

⑥“传”字为贴纸覆改,与原书笔迹不同。

⑦原作“诗补义”,后点删去“义”字,下补“传”字,与原书笔迹不同。

⑧“经”字为旁批补入,与原书笔迹不同。

⑨“殷氏”二字墨色稍浅,与原书笔迹不同。

⑩“殷氏”二字与原书笔迹不同,应为后补。

⑪七阁《日讲诗经解义》一书从未入架,故《庋藏表》此处虽未注明“留空”,实为空函。

⑫“留空”二字与原书笔迹不同,字形较草。

⑬原作“春秋左氏传续说”,后圈删去“春秋”二字。

⑭“书”字写于“一”字上,与原书笔迹不同。

⑮“疏”字墨色稍浅,与原书笔迹不同。

⑯原作“孝经正义”,后圈去“正义”二字,补“注疏”二字,与原书笔迹不同。

架次	层次	函次	《皮藏表》	《文渊阁分架图》
20	2	932	《广韵》	《重修广韵》
20	3	938	《增修校正押韵释疑》《九经补韵》	《增修校正押韵释疑》《九经韵补》 ^①

二书史部函次、函数、合函、合册基本相同,个别记载略有不同(详见表6)。最大差异在于第31、32架贮藏《南巡盛典》《万寿盛典》《八旗通志》的函数有别,这也使得《万寿盛典》等14种书的函次也发生了变化^②。

表6 史部著录差异表

架次	层次	函次	《皮藏表》	《文渊阁分架图》
12	4	1526	《战国策校注》	《战国策校注》 铜
13	1	1541	《革除逸史》 六 ^③	《革除逸史》
14	2	1602	《说论集》《左史谏草》《商文毅奏稿》 ^④	《说论集》《左史谏草》《商文毅疏稿》
14	2	1608	《杨文忠三录》《何文简疏议》 一	《杨文忠三录》《何文简疏议》 ^⑤

子部差异主要体现在书名方面(详见表7)。《文渊阁分架图》多著录的《传神秘要》《乐府杂录》两种书,前者附于《小山画谱》之后,合为1册;后者附于《羯鼓录》之后,合为1册。故当为《皮藏表》漏记。

表7 子部著录差异表

架次	层次	函次	《皮藏表》	《文渊阁分架图》
3	4	2734	《商子》《韩子》	《商子》《韩非子》 ^⑥
10	6	3253	《小山画谱》《琴史》《松弦馆琴谱》	《小山画谱》《传神秘要》 ^⑦ 《琴史》《松弦馆琴谱》

①此书应作《九经补韵》,《文渊阁分架图》书写有误。
②史部第31、32架库书函数、函次变化及原因,详见下文第五节。
③“六”与“革除逸史”间有勾乙符号,据乙。
④原作“商文毅疏稿”。
⑤“何文简疏议”与原书笔迹不同,应为后补。
⑥“非”字字形略有异,疑为后补。
⑦“传神秘要”与原书笔迹不同,应为后补。

续表

架次	层次	函次	《皮藏表》	《文渊阁分架图》
10	6	3257	《学古录》《印典》《羯鼓录》	《学古录》《印典》《羯鼓录》 《乐府杂录》 ^①
16	4	3669	《古今合璧事类备要》 ^②	《古今合璧事类》
22	4	4096	《道德指归论》《老子道德经注》 ^③	《道德指归论》《老子道德经注》王弼

集部同样以书名差异为主(详见表8)。此外,《皮藏表》第17架第5层第5334函写有“《御制诗四集》末函”,第5335函写有“自此留空”,即自此至第18架第1层第5354函为空函,共22函。

表8 集部著录差异表

架次	层次	函次	《皮藏表》	《文渊阁分架图》
8	3	4658	《橘山四六》 ^④	《橘山集》
10	4	4813	《草庐集》一	《草庐集》 又名吴文正集 ^⑤
15	1	5143	《庄渠遗书》 ^⑥	《庄渠遗考》
16	4	5250	《宗伯记》 ^⑦	《宗伯集》
16	5	5258	《少墟集》	《冯少墟集》
17	2	5294	《御制文集》 初集 ^⑧	《御制文集》
17	2	5296	二集 三	三
17	2	5299	《御制诗集》一 初集	《御制诗集》
17	4	5327	二十九 ^⑨	《御制诗集》 ^⑩ 二十九

①“乐府杂录”与原书笔迹不同,应为后补。

②“备要”两字,与原书笔迹不同,墨色稍浅,应为后补。

③原有“王弼”二字。

④原作“橘山集”,浅墨笔圈去“集”字,改为“四六”。

⑤“又名吴文正集”六字与原书笔迹稍有不同。

⑥原作“庄渠遗考”,墨笔圈去“考”字,改为“书”。

⑦原作“宗伯传”,墨笔圈去“传”字,改为“记”。

⑧《皮藏表》“初集”及下“二集”“初集”“御制诗四集 末函”“自此留空”,笔迹相同且墨色较浅,但均与原书笔迹不同。

⑨原有“御制诗集”四字,墨笔点删去。

⑩“御制诗集”与下“御制诗五集”笔迹相同,但均与原书笔迹不同。

续表

架次	层次	函次	《皮藏表》	《文渊阁分架图》
17	5	5334	《御制诗四集》末函 三十六	三十六
17	5	5335	自此留空 三十七	《御制诗五集》 三十七
19	1	5426	《松泉文集》	《松泉集》 ^①
28	5	6130	《十五家词》 ^②	《十六家词》 ^③

通过上述比较可知,《皮藏表》与《文渊阁分架图》在形制上基本相同,所载书名、书次、函次、函数等并无太大差异,部分书名的不同是由于二书写录后有不同程度的修改造成的。二者最主要差异正是由于嘉庆九年缮补《八旗通志》《御制诗集》等书归架造成的,《皮藏表》的记录停留在嘉庆九年前后,《文渊阁分架图》则继续抽换、更新。

除此之外,二书书写上还存在一定的联系,如《文渊阁分架图》经部第10架第2层第450函《礼记集说》框格上方横书“卫氏”二字,《皮藏表》亦横书“卫氏”二字于书名上,类似补入情况还见于经部第931函、子部第2672函等;《文渊阁分架图》经部第19架第4层第905函内补入“古音骈字续编”,《皮藏表》亦有,且笔迹与本函所记其他书名相同,类似情况还见于子部第4119函等;《文渊阁分架图》史部第15架第4层第1680函《春秋列国臣传》圈去“列国”二字,《皮藏表》作《春秋臣传》,类似情况还见于子部第2673函等。《文渊阁分架图》经部第7架第4层第336函为《毛诗写官记》《诗札》合册、《诗传诗说驳义》和《续诗传鸟名卷》,《皮藏表》此函贴纸重写,内容与《文渊阁分架图》同,笔迹与本页所记其他书名不同。《文渊阁分架图》子部第22架第4层第4096函《老子道德经注》后注明“王弼”,《皮藏表》墨笔点删去原抄“王弼”二字;集部第17架第4层第5327函《御制诗集》二十九,《皮藏表》墨笔点删去原抄“御制诗集”四字。

文溯、文津二阁目前仅有横式《四库全书分架图》,将其与《皮藏表》相比有较多不同。因北四阁《四库全书》办理相对一致,故而分架图在书次上差异较小,如《文溯阁分架图》经部第1架第1层第5函著录《周易注》《陆氏易解》二书,两书的次序为《周易注》在《陆氏易解》之上,宣统元年《文溯阁四库全书函架目录》记载清查文溯阁书函实际情况相同,而《皮藏表》则是《陆氏易解》置于《周易注》之上。同时《文溯阁分架图》所载书名与《皮藏表》存

①原作“松泉文集”,点删去“文”字。

②原作“十六家词”。

③原作“十五家词”,又点删去“五”,旁补“六”字,笔迹有异。

在许多不同,如《文溯阁分架图》记作《洗心斋读易述》《尚书详解》《书集传》《诗经疏义》《诗集传大全》等,与《文溯阁四库全书函架目录》所记一致,而《皮藏表》作《读易述》《夏氏尚书详解》《书经集传》《诗经疏义会通》《诗传大全》。除此之外,《文津阁分架图》与《皮藏表》也有诸多不同,较为明显的如春秋类《春秋提要》一书附于《春秋经解》末册,《文津阁分架图》不载而《皮藏表》记载等等。

《皮藏表》与《文渊阁分架图》性质相似,且《皮藏表》所抄底本与《文渊阁分架图》差别较小、联系颇多,甚至具有一定的源流关系,故《皮藏表》应归属于文渊阁系统。但北四阁《四库全书》办理相对一致,《皮藏表》与四阁分架图、以及四阁分架图之间实际差别不大,因此《皮藏表》虽属文渊阁系统,亦能反映该时期“北四阁”《四库全书》的皮藏状况。

五、从《皮藏表》观察库书的改动、排架

《皮藏表》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,通过对其基本面貌的分析,有助于了解《四库全书分架图》的性质、分架图如何随着库书的补颁修订进行抽换修改,进一步深化学界对于分架图的认识。而《皮藏表》最大的价值在于反映了嘉庆四年至嘉庆九年之间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甚至“北四阁”《四库全书》的排架情况,可以据此窥探该时期《四库全书》增补抽改和架次调整排定的真实情况。

嘉庆八年五月初九日庆桂奏明《四库全书》空函及应增书籍情形称:“查全书集部内原留空二十函,计已缮之《圣制诗五集》及现在恭缮之《圣制诗餘集》、《圣制文三集》、《文餘集》四种,归架时尽敷装贮。……惟《八旗通志》一书,重经添纂,自应归入史部。查史部架内《南巡盛典》原定十四函,迨书成归架只有七函,尚餘空七函;《八旗通志》原定十九函,今重纂之书增多七函。二书均在三十架、三十一架,次序相连,以《南巡盛典》餘出之七空函,归入《八旗通志》增多七函之书,适相符合,只须改刊数十匣面,彼此均无窒碍。至平定安南、巴勒布、廓尔喀《纪略》三种,均系事在《四库全书》告成以后,约计三书篇页共需八函,按次应入于史部第九架内各纪略之后。臣等详细检看,实无餘空地步,必须抽衬改函,移动史部数十架数百函之书,方能腾挪归入。”^①然而库书实际的增入排架并非完全如奏折所言,从《皮藏表》到《文渊阁分架图》恰恰直观展示了这一过程。

首先,庆桂称《南巡盛典》与《八旗通志》“二书均在三十架、三十一架”,是错误的。无论是据《皮藏表》,还是《文渊阁分架图》回推,都可以看到《南

^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:《纂修四库全书档案》,第2383-2384页。

巡盛典》在未改函前应归在史部第31架第1层第2406函至第2层第2419函,共14函。《八旗通志》应归在史部第31架第4层第2437函至第32架第1层第2455函,共19函。

其次,“查史部架内《南巡盛典》原定十四函,迨书成归架只有七函,尚餘空七函”,则文渊阁库书“空七函”为当时排架的实际情况。而“《八旗通志》原定十九函,今重纂之书增多七函”“以《南巡盛典》餘出之七空函,归入《八旗通志》增多七函之书”,此二处所称“七函”为《八旗通志》成书后,庆桂估测多出的书籍大约能装7函。库书的抽衬改函,十分不易,若改换函数较多,则需“移动史部数十架数百函之书,方能腾挪归入”。为方便起见,此时可利用《南巡盛典》所空7函的空间。比较《皮藏表》与《文渊阁分架图》可知,在实际抽换过程中,《八旗通志》重纂之书装函超过了预计的7函,实装9函,归架在第31架第3层第2428函至第2436函。超出的2函书的空间只能靠压缩其他书来实现,故又将《南巡盛典》由原来的7函改装为6函,归架在第31架第1层第2406函至第2411函;将《万寿盛典》由原来的9函改装为8函,归架在第31架第1层第2412函至第2层第2419函;其后依次贮藏《历代建元考》等书共8函、《八旗通志》28函。据文曾据此条档案称:“嘉庆八年时曾将《八旗通志》重新缮写装函,而且函数由最初的19函增加至26函。……陈垣所录文津阁《八旗通志》,即为嘉庆八年重新添纂而补入的,但函数却与档案记载的26函略有差异。”现实情况是,嘉庆八年重新缮写的《八旗通志》由原来的19函改装至28函,未曾有过26函的情况。

再次,除了史部的改动,此次更涉及集部增补与排架。据《皮藏表》可知,集部第17架第2层第5294函至第5295函为《御制文集初集》2函,第5296函至第5298函为《御制文集二集》3函,第5299函至第17架第5层第5334函为《御制诗集》共4集36函,其后有20函空匣,待补的《御制诗五集》《御制诗餘集》《御制文三集》《文餘集》只需“归架时尽敷装贮”即可。较之《皮藏表》,《文渊阁分架图》第17架并未进行抽换,而是在第5335函注明“《御制诗五集》”,其他书名、函次并未改动,似乎集部所补书籍俱排架入此20个空函中。但据已抽换的横式《文渊阁分架图》可知,实际情况是《御制文集》6函排架入第17架第2层5294函至第5299函,《御制诗集》55函排架入第5300函至第18架第1层第5354函。原先预留56函装《御制诗集》,实际排架因《御制文集》的补入,而压缩成55函,整体函次又往后推1函。这也解释了嘉庆十一年八月为何要将文溯阁集部56个空函发回京(说详下文),而不是仅仅将原先预留的20个空函发回京。

这里还有一点值得注意,横式《文渊阁分架图》仅记载《御制诗集》共55函,编号1到55,未注明各集具体函数。1917年清点文溯阁而编成的《清查

四库全书架榻函卷考》记载文渊阁第 17 架第 2 层 5294 函至第 5304 函庋藏《御制文初集》2 函、《御制文二集》3 函、《御制文三集》1 函、《御制诗初集》5 函;第 3 层第 5305 函至 5316 函庋藏《御制诗二集》12 函;第 4 层第 5317 函至第 5328 函庋藏《御制诗三集》12 函;第 5 层第 5329 函至 5340 函庋藏《御制诗四集》12 函;第 6 层第 5341 函至 5352 函庋藏《御制诗五集》12 函;第 18 架第 1 层第 5353、5354 函合置《御制文余集》与《御制诗余集》共 14 册 2 函。此时《御制文余集》排架位置与两种《分架图》记载有异,未能判断其是嘉庆时期排架的实际情况而分架图记载疏漏,还是后来库书有所调整。

最后,文渊阁库书的补入和排架的变化,又直接影响了其他六阁,相关改动足足用了三年才最终完成。嘉庆十一年八月,文溯阁发回《南巡盛典》《万寿盛典》以及 23 函书匣,原装《历代建元考》及《八旗通志》的 27 函空书匣,《御制诗集》的 56 函书匣(其中前 36 匣装《御制诗集》共四集),史部、集部《分架图》2 册。书匣、《分架图》经修改后,并史部新增《八旗通志》9 函,集部新增《御制诗文三集》《文余集》《诗余集》,以及《御制诗五集》发回沈阳,重新进行排架修改,至嘉庆十二年三月初一日完成^①。此次《分架图》的修改,便是参照了横式《文渊阁分架图》,史部第 31 架与集部第 17 架排架次序如同文渊阁。文津阁为了新颁的 28 函《八旗通志》,也压缩了《南巡盛典》与《八旬万寿盛典》的装函,空出 2 函。同时,《御制文集》共装 6 函、《御制诗集》共装 55 函,函数、排架与文渊阁相同^②。

六、结语

《四库全书分架图》详细记载了《四库全书》的排架位置,既便于检阅所

①《佐领延福等为业已派员将文溯阁撤出〈南巡盛典〉等书送京事呈请知会武英殿修书处》《奉天提督学政衙门为文溯阁改补书籍加宝归架事咨盛京内务府》,《盛京皇宫和关外三陵档案》,第 138-139 页。关于文溯阁库书的撤改、补函,详参琚小飞:《文溯阁〈四库全书〉的撤改与补函——以相关档案为中心的考察》,《文献》2020 年第 2 期,第 45-54 页。

②嘉庆十一年八月,“江浙三阁应补之书,俟用宝后交武英殿存贮,照向办之例遇便员带往,各该处该管官自行照旧式装璜归架,其排架图令其送京改缮发往”(《盛京皇宫和关外三陵档案》,第 138-139 页)。而文汇阁《八旗通志》于本年由吴大使解京收回,次年三月另发一部《八旗通志》等,装订计 180 本,改装 28 函。《文汇阁目录》称《南巡盛典》“嘉庆十二年奉改六函”,《八旬万寿盛典》“嘉庆十二年奉改八函”。二书的奉改,正是要为 28 函的《八旗通志》在实际排架时腾出空间。据《钦颁文澜阁四库全书书目清册》可知,文澜阁最终庋藏《御制文集》22 册、《御制诗集》332 册。

藏库书,又起到了指导库书重新排架的作用。该图会随着库书改换、补颁,进行抽换修改,甚至重新缮写。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所藏的《四库书目皮藏表》题名应为收藏者所写,实际该书是直式《钦定四库全书分架图》。

《皮藏表》与《文汇阁目录》《文宗阁清册》《文澜阁清册》存在诸多本质性差异,可知其并非自“南三阁”散出。但它与直式《文渊阁分架图》性质相似,外观形制完全相同,记载内容基本一致,部分书名差异来自写录后的修改、增补,最主要的不同是因嘉庆九年补颁《八旗通志》等书调整排架造成的。综合各方面因素,可确定《皮藏表》属于文渊阁系统,是馆臣办理库书补函、排架时抄写的一个工作簿,抄写于嘉庆四年(1799)至嘉庆九年二月初一日之间,所抄分架图主体部分为乾隆时期的情形,又补入了嘉庆时期库书排架变动的信息。

《皮藏表》反映了嘉庆四年至嘉庆九年之间文渊阁甚至“北四阁”《四库全书》的排架情况,可借此厘清嘉庆九年《四库全书》史部第31、32架以及集部第17、18架库书抽换、排架方案的实际情况。文渊阁库书的补入和排架的变化,又直接影响了其他六阁,直至嘉庆十二年这一改动才最终完成。

在对《皮藏表》的考察过程中,我们也对以往学界关注不多的两种《文渊阁分架图》的基本性质和抽换做了基本的判断;而这两种分架图之差异,仍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。分架图既然指导库书排架,又辅助书函匣面的修改,当能与《四库全书》书架、书匣相互验证。但囿于现实情况,未能一一目验,实存许多遗憾。

本文蒙匿名审稿专家提出若干宝贵意见,谨此致以由衷的感谢。

【作者简介】黄汉,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古典文献学硕士研究生。研究方向:经学文献、清代文献。